

华人与东南亚经济

(马来西亚) 文平强著 许光达译

(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 雪兰莪州 43000;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510630)

【关键词】华人; 人口; 东南亚; 经济

【摘要】华人与东南亚诸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在西方殖民者的鼓励下, 大量华人移民东南亚并大大促进了该地区的发展。东南亚国民经济所取得的诸方面成就与华人的存在密不可分。本文认为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华人在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有关, 并阐释了东南亚地区和马来西亚各州华人口比重与人均收入的关系。本文还从华人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这一现象背后可能的原因, 并将简单论及这一现象带来的启示。

【中图分类号】D73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0)05-0055-10

一 引言

在过去200年, 华人为东南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地区海外华人数量最多, 且移民历史悠久。华人在东南亚各国的数量, 少则只占所在国家的很小部分, 多则可以占到所在国家总人口的3/4。

伴随着16世纪以来殖民统治的不断扩张, 东南亚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致力于拓展帝国利益的欧洲殖民者们, 为了开发殖民地资源, 意识到了华人作为劳动力资源及其自身的创业精神背后所蕴藏的巨大经济潜力。其时, 华人与东南亚商贸往来已达几个世纪之久, 并对这一地区非常熟悉, 但真正使他们变得几乎不可替代的却是他们的劳动力。殖民统治者因此开创了一个人口密集迁移时期, 从中国、印度次大陆乃至东南亚地区内部引进大量劳动力。此番人口的大量迁入给东南亚地区不同地方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华人向东南亚地区的移民继而终止。东南亚的华人逐渐适应了新的社会政治环境, 他们甚至与当地联合起来一起为所在国的独立而斗争。到了今天, 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基本上都是当地出生并且已经成为所在国真正的公民和利益相关者。东南亚华人的数量基本上保持稳定, 其变化主要依赖人口的自然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中国大陆华人的流出有绕开东南亚(也许新加坡除外)的趋势, 与此同时, 东南亚地

区的华人也大量流出。

东南亚各国取得独立之后的发展道路和发展速度各不相同。尽管从整体上看, 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农业、采矿业、零售业与沿海贸易, 并且还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 但事实上该地区国家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经济层次。新加坡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集团富有国家; 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是亚洲新兴经济体; 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则属于较落后的贫穷国家之列。但是近几年, 越南正在脱颖而出, 同时印度尼西亚则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候补国家。

20世纪60年代, 日本实现了经济腾飞,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从70年代开始也迅速发展成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即“亚洲四小龙”)。这引起了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 有关研究开始从经济发展与商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去考察, 以期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同样, 东南亚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也逐渐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 华人的角色与作用自然得到了应有的关注。

通常情况下, 这些针对华人所发挥作用的研究很少就华人人口做过绝对或相对的统计。虽然华人在很多方面具有差异性, 但总体上他们是拥有一种共同文化的统一实体。一般而言, 有华人大量存在的国家, 中华文化很可能会在其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被认为是评价一国经济表现的综合手段, 因此本文假设, 华人人口在一

【收稿日期】2010-06-13

【作者简介】文平强, 博士, 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教授所长。

【译者简介】许光达,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国际关系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

国的总数所占的比重及其与该国的经济表现有着直接的关系。

本文主要探究华人人口所占比重与东南亚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各州经济发展的广泛联系，并将结合华人文化探讨这一现象背后可能的原因，而对于这一现象带来的启示，本文也将论及。

二 华人：一个文化共同体

华人去往东南亚经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1]。他们对这一地区的认识主要得益于一些商人所从事的中华帝国的一系列对外使命或探险活动，而这些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除此之外，记载于公元1178年到公元1822年的各类游记也发挥了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有公元1292年蒙古人对爪哇岛的探险和明朝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的公元1405年到公元1430年的郑和下西洋^[2]。华人最初称东南亚为“南海”或“西南海”，进入17世纪，这个地区还被以婆罗洲岛为界，冠以“东洋”和“西洋”之名^[3]。直到近代，

“南洋”才成为普遍的称谓。因此，自郑和下西洋以来，华人就以一种更为正式的方式与东南亚建立了联系，而且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华人已经在东南亚各处建立了商业团体。日渐增多的定居下来的华人逐渐演化成当地出生的群体，例如生活在爪哇岛和马六甲的土生华人^[4]。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华人已经遍布全球。早期的华人移民主要来源于中国南部的广大地区。其中广东和福建两省是最主要的来源地，海南与广西则是第二大来源地，此外长江以南与这些省份相邻的一些地区也有相当多的移民。华人从19世纪就开始移民至东南亚从事港口、种植园与锡矿业，另一部分则流向北美与澳大利亚的采金业^[5]。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引发了新一轮移民潮，其密集程度可以和早期移民相匹敌。此次移民潮与之前相比有两个明显的区别：一是移民输出地遍布中国南北各地；二是相对东南亚而言，他们更愿意选择移往北美、欧洲与澳大利亚。

表1 东南亚各国人口与收入统计数据

国家	人口总数 (截至2009年; 单位:百万)	华人人口总数与 所占百分比 (2004年数据; 人口单位:百万)	GDP(按 官方汇率计算; 2008年数据; 单位:十亿美元)	人均GDP (按官方汇率计 算;2008数据; 单位:美元)	GDP(按购 买力平价计算; 2008年数据; 单位:十亿美元)	人均GDP(按 购买力平价计 算;2008年数 据;单位:美元)
新加坡	4.658	3.58 (76.8%)	181.9	39,051	237.3	51,000
文莱	0.388	0.44 (11.2%)	14.6	37,500	20.25	53,100
马来西亚	25.715	6.09 (23.7%)	222.2	8,641	384.3	15,200
泰国	65.905	9.23 (14%)	273.2	4,145	547.4	8,400
印尼	240.271	9.61 (4%)	511.8	2,130	914.6	3,900
菲律宾	97.976	1.47 (1.5%)	168.6	1,721	317.5	3,300
越南	86.967	1.22 (1.4%)	89.83	1,033	241.7	2,800
老挝	6.835	—	5.26	770	13.98	2,100
柬埔寨	14.494	0.14 (1%)	11.2	773	27.9	2,000
缅甸	48.138	1.44 (3%)	27.18	565	55.13	1,200

说明：人口数量估算基于美国人口统计局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http://indexmundi.com>

东南亚地区现有的大约3,300万华人（见表1）并非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一的种族群体，相反地，他们有着类似不同民族的多样性。由于来自不同地方，他们操持的方言互不相同，因而还有着不同的风俗、饮食习惯与其他文化关系。尤其在早期，方言的差异还体现在以此来辨别不同的经济门类；至今方言差异仍然通过以相同宗族和祖

籍为基础建立地缘和血缘会馆而发挥着重大作用。这样的组织非常之多，在马来西亚就有数百个。在全球范围内，以方言和姓氏为基础建立的会馆为了共同利益形成跨界经营与文化网络。尽管华人内部有着多样性，但是事实上却有一种文化将他们持久地凝结成一个大集体。这种文化主要建立在合理吸收了佛教、道教和其他宗教思想精华的儒家思想的

基础上,并由汉字这种书写系统强有力地粘合起来。作为一种表意文字和交流媒介,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其跨越时空的文化持久性与粘合力令人惊叹。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提倡不同文化和思想的求同存异,强调社会和谐、言行的中庸之道、诚实待人处事、牺牲“小我”为“大我”,追求普遍的爱与和谐的社会关系,在个人奋斗上提倡自强不息和不服输的精神^[6]。

自强不息、自我信赖与勤勉的精神都是引导华人一生的重要价值观。这些品质已经为无数凭借进取心和不服输精神白手起家、积累财富的例子所证明^[7]。无数富有进取心的华人在各个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些先驱及其追随者的努力正是对追求成功所必备品质的最好诠释,也正是这种非凡的品质使得这些企业家为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点上,他们已经得到了所在国以及整个华人群体的认可与赞誉。

三 海外华人与经济发展

世界各国按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分为三类,即穷国、富国和介乎二者之间的国家。最早并有最多国家进入富国俱乐部的主要是欧洲和美洲,随后是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一些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最为贫穷的国家集中在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的一部分地区;而介于中间的是一些经济发展非常有活力并且具有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

经济发展是一个由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复杂过程。如果我们只把人均收入作为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那么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明显的。例如,马来亚(现在的马来西亚半岛)和加纳都是在1957年获得独立,并且在当时处于几乎相同的发展水平上。但如今,马来西亚比加纳富裕了三倍。20世纪50年代,马来西亚的收入与中国台湾或者韩国处于同等水平,但现在已经令人遗憾地落在后面。为什么在过去大约50年中,马来西亚超越了加纳却没能跟上中国台湾或者韩国的步伐?经济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差异。

关于华人在商业与经济发展中所发挥作用的著作层出不穷。有趣的是,除了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这个课题也引起了许多从事儒家思想以及其他哲学研究的学者的注意。华人与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关系或许可以从东南亚(整个地区)和马来西亚各州(局部)这两个不同层面来说明。

(一) 东南亚

东南亚经济的崛起是东亚经济奇迹的一部分。日本经济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飞速发展,很快便

成为超级经济大国,许多国家纷纷效仿其发展模式。在亚洲,最先紧跟日本步伐的是后来被称作“亚洲四小龙”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与韩国。这些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都是弹丸之地(其中,最大的韩国面积也只有99,100平方公里),自然资源极度匮乏,人口密集度非常高,而且在政治上被限制进入一些更大的实体而无法扩展其国内市场(1997年之后的香港除外)。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但有趣的是,这几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着一种基于儒家思想的文化传统,其中三个还以华人社会为主导。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最重要的资源是拥有较高受教育水平与技能的劳动力。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特别归因于“有利于发展的文化因素、卓越的经济管理水平、良好的国际环境与技术环境、国外援助、艰苦卓绝的工作与奉献精神”^[8]。

东盟老成员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尼带领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加入“新兴经济体”的行列。“亚洲四小龙”与东盟四国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出口推动型工业、优惠的商业政策和有效的制度框架;其他值得注意的因素还有内蕴于儒家务实与努力工作观念中的强烈的职业道德规范、极高的国内储蓄水平以及资本投资水平。

华人资本与华人企业家的能力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得到了普遍的公认。华人在东南亚各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与人均收入似乎有着直接联系。华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77%,其次是马来西亚,占24%,接着依次是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在这些国家,华人的实际人口规模都大到足以对经济发展形成重大影响。除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的数量很难统计,原因在于,诸如同化政策、双重身份以及政治环境等因素常常模糊种族界限。由于主导政策在限制和开放之间摇摆不定,华人也相应地在被同化和保持身份之间徘徊。

如果以人均GDP来表征经济发展水平,新加坡最为突出。相对而言,马来西亚差很多,泰国、印尼、菲律宾和越南就更少了(见表1)。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文莱的经济发展偏离常规模式,其一半的GDP来源于石油与天然气,然而分享财富的却是很小的人口规模。除去这个特殊案例,我们可以注意到,华人口所占的比重与人均GDP有着明显的关联,而这样一种紧密的联系很可能归因于一些确定的,而非随机的因素。

华人口所占比重与按官方汇率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之间的相关性是非常显著的,甚

至在将文莱纳入估算时情况亦是如此（见表2）。

表2 东南亚华人人口比例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度（2008年数据）

	华人 (%)
华人 (%)	1
人均GDP (按官方汇率计算)	0.726534
人均GDP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0.70186

说明：此表中“相关度”指皮尔逊相关系数。

（二）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一个拥有中等国土面积与人口规模的国家。华人在马来西亚定居已经接近十代之久，他们在国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9]。马来西亚拥有丰富的锡矿、石油、天然气和木材等资源，还有广阔的适于种植橡胶、棕榈油和其他热带作物的土地。

马来西亚人口为2,500万，分布极为不均衡，华人更是如此。正如前文所探讨的，东南亚各国华人人口所占比重与人均收入存在密切关系，马来西亚各州也存在类似现象（见表3）。

表3 华人人口所占比重与马来西亚各州家庭月平均收入情况

州名	华人所占比重 (2000年数据; 单位:%)	家庭月平均收入 (2004年数据; 单位:令吉)
吉隆坡*	43.5	5,011
雪兰莪	30.7	5,175
槟榔屿	46.5	3,531
柔佛	35.4	3,076
森美兰	25.6	2,886
马六甲	29.1	2,797
沙越拉	26.7	2,725
沙巴**	13.2	2,487
彭亨	17.7	2,410
霹雳	32.0	2,207
吉打	14.9	2,126
玻璃市	10.3	2,046
丁家奴	2.8	1,984
吉兰丹	3.8	1,829
马来群岛	26.0	3,249

说明：*包括布城；**包括纳闽岛。

数据来源：Malaysia, Government of 2006, Ninth Malaysia Plan 2006 - 2010, Putrajaya; Economic Planning Unit,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p. 356, p. 358; DSM, 2001

表3中两个变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713。不可否认的是，采用家庭月平均收入作为各州经济发展状况的衡量标准可能略显粗糙，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对于东南亚而言，以上分析即使不能证明这种相关性的确切成因和影响关系，但也至少能说明这两者之间绝不是无关的。

四 文化与经济发展

东南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开源于西方殖民统治。在这个时期，由于大规模的移民与不断增加的贸易机会，华商及各类华人移民与这个地区的历史联系也真正得以加深。从现代意义上来讲，殖民统治初期的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未开发状态，开发各类资源所需劳动力的匮乏使得殖民者转向中国和印度寻找劳力。无论他们对华人的认知如何，华人作为劳动力和纳税人所体现的“价值”却得到欧洲殖民者几乎一致的认可。

要研究华人在所在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必须将文化环境的重要性一并考虑。无论信仰何种宗教，华人都把儒家思想作为他们文化的源泉和行为准则^[10]。事实上，海外华人对这些价值观保存与践行的程度要比中国本土深得多^[11]。华人在满怀热情地自发维护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吸收了许多当地文化的因素。透过这种文化各方面的实践，或许可以对华人的经济行为有所洞察。

（一）经济机会

迫于贫穷和受剥削的无奈，华人移民怀揣着“有机会成为企业家、工人或职员”的梦想，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土地^[12]。在东南亚，华人的角色必须被纳入多种族尤其是本土族群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从经济角度而言，早期的华人移民发现当地人在初期的现代经济活动中并不积极。当地许多人对于在种植园或者矿山中长时间从事受管制的劳动非常抵触。他们珍视自己的闲暇时光、拒绝繁重的体力劳动事实上不无理由：一是东南亚地处热带，有着丰富的资源；二是工资少得可怜^[13]。而在某些地方，例如英属马来亚，家长式的殖民政策有意识地将本地居民与商业和小型贸易隔离开来，以使其免受“堕落”的影响，同时将其限制在乡村地区以保持一种仅能维持生存最基本需要的经济状况^[14]。荷兰人则像对待小孩一样看待印尼本土居民，认为应该帮助他们，给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15]。用佛尼威尔（Furnviall）的话来说就是：“让我们帮助你，让我们告诉你怎样做，让我们为你们做。”^[16]

在马来西亚，马来人的思想和心态与其落后的

经济有关。他们对自身能力缺乏自信且过分依赖外部援助^[17]。长期以来,政府一直面临转变本地居民思维方式的问题。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敦·拉扎克(Tun Haji Abdul Razak)曾经指出马来人不能完全融入社会经济发展中就是因为知识缺乏和生活保守而导致的思维僵化^[18]。马来知识分子曾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起过一场名为“精神革命”的运动,试图号召人们改变思维习惯以跟上时代潮流,抓住前进的机会^[19]。

自1990年国家发展政策(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取代1970年开始实施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以来,马来西亚土著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多实质上的改善,但是很难判断这些改进是得益于思维方式的转变还是政府补贴以及政策对商业、就业和教育的偏重。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持续数年的优惠政策就像“意外收获”,很容易“使人懈怠并造成一种自认无能的感觉”^[20]。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Mohamed Mahathir)于1990年发表的马来西亚《2020年宏愿》称马来西亚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并敦促要克服心理上的“各种挑战”,建设一个“自信、创新、富有前瞻性”的社会^[21]。直至今日,马来西亚官方文件依然为马来西亚拥有一流的基础设施却只有三流的心智水平而耿耿于怀^[22]。所以,创造一个全新的马来西亚的变革过程正是政府关注的重点^[23]。

早期来到东南亚的华人积极投身采矿业、农业并建立定居点。他们在新兴的现代经济中找到了大量机会,并为殖民社会与日俱增的各类需求提供服务。在英属马来亚,欧洲人是现代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管理精英,马来人被培训成小官员,华人则成为这两者的中间人。

不过,从另一方面而言,殖民时期和独立后的政策都是与华人的经济利益相违背的。印尼限制华人在乡村地区的贸易。南越于1956年禁止华人从事11种贸易^[24]。1962年,缅甸开始推行社会主义,将私人企业与商业设施收归国有,华人主要被限制在服务业、小型家庭手工业和黑市^[25]。

马来西亚独立后出现的问题常被归咎于华人“主宰”经济所致。自1970年开始,在新经济政策指导下的“重组社会”系统地限制了华人资本和企业所能涉足的领域。在印尼,华人大财团的“排挤”成为本地企业经营不善最常见的借口^[26]。

越是华人的经济参与受到鼓励、扶持或者经营

环境越好的国家,华人的影响也越积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新加坡。和香港一样,新加坡是一个华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国际经济体,因此,新加坡是最早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加入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行列的东南亚国家,这一点也不奇怪。还有一点非常清楚的是,新加坡的经济计划和发展政策由世界上受过最好培训且最高效廉洁的政府机构所掌握,然而这些政策如果少了民众积极勤勉的支持也将毫无意义。同样重要的是,新加坡和香港一样,也是世界上腐败程度最低的地区。

(二) 传统的经济实践

华人社会的传统经济行为衍生出丰富多样的组织经济活动的惯例和实践。这些日积月累的经验已经演化成普通民众借以解决实际需要的民间资源。

其中一个有价值的经验便是集资。例如,信贷制度是赊销业务出现时的衍生品。在港主制度下早期棕榈膏与胡椒种植业的发展正是得益于金融信贷的使用^[27]。通常的银会,作为一种存在已久的储蓄与借贷机构,是一种非正式的经济互助形式,其通过互助机制建立一种融洽的借贷关系^[28]。银会不仅教给其成员处理资金问题的基本技巧,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机制,华人借以克服了初来乍到的一系列劣势。他们不需要向高利贷者支付高额利息,也不用担心无法从银行借贷,通过银会便可以迅速获得所需资金。作为一种储蓄或是生成资本的形式,银会同时基于个人关系与信用构建起了社会与商业网络^①。

这种民间集资形式在东南亚本土社会几乎难以找到,而华人在商业领域的资本组织方面则有着先天优势。在美国,银会有助于克服由于歧视移民给华人带来的种种不便,而且银会的存在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亚裔移民商业活动如此活跃并且比那些在美国出生的不具备这种传统储蓄实践的黑人更有优势^[29]。

筹集资金的传统形式还有当铺和钱庄。当铺收取动产作为抵押,向对方放债,直到今天还存在。早期的金铺同时也担当资金借贷的可信代理。而对于银行而言,华人是欧洲人之外唯一开设银行来服务于亚裔商人的。1903年,英属马来亚第一家华人银行在新加坡成立。到1950年,新加坡已经有14家华人银行,其中在马来亚的两家是合并到一起的^[30]。

华人是马来亚和东南亚地区可以与殖民者相提并论的主要投资来源。1930年,华人在东南亚地

① 银会曾经是一种非常普及的集资形式。1978年中国台湾省的参会率高达85%,通过银会筹措的资金高达1,140亿新台币,相当于当年台湾省GDP的22%,见Wu-Beyerns, I-Chuan, "Hui: Chinese business in action", in Chan Kwok Bun ed.,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State, Economy and Culture*, Singapore: Prentice Hall, 2000, p. 138.

区的总投资大约为202,200万海峡元(即叻币)。在投往马来亚的49,500万元中^[31],用于农业的有24,400万,占49%;接着是贸易和金融,16,500万,占33%;采矿业5,000万。华人还投资了一些新兴产业,比如有2,300万元投入橡胶加工业、碾米工业、菠萝种植业和制造业;1,100万则用于渔业、运输业和房地产^[32]。

在商业活动中,华人借助了一些流传很久的可靠手段,最为常见的就是算盘。在一个技术熟练的会计手中,算盘的效率甚至可以超过现代手持计算器。有资料显示,中国算盘发明于公元190年或公元570年,无论哪一个时间都要比欧洲第一个计算工具出现的1642年早得多^[33]。直到今天,算盘依然是中国商业的一个象征。

华人的经营之道可能要追溯至陶朱公,他的理论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管理理论之一。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末期(公元前500年左右)越王勾践的谋士,帮助越王击败吴王夫差成就霸业后,功成隐退,经商理财,富甲天下,人称“陶朱公”,后世商人尊其为“商祖”。他留下的“商训十二则”也被悬挂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许多华人商铺的墙壁上^①。

儒家思想的核心框架是五条有关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五伦”。它们涉及基于血缘、地域和友情构建的社会关系,在华人移民群体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精神作用。早期较为正式的协会就是“公司”^[34]。到后来,基于宗族、祖籍、姓氏、方言和行业建立的各式各样的协会成为华人社会和经济组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协会最基本的目标就是帮助其成员适应新环境,互相扶持,减少摩擦和不必要的竞争,管理商业实践和行为,保护集团利益,最终确保所有成员的生存与成功。在这些协会中,建立起来的人际网络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给业务往来提供了诸多便利。为了避免政府管理带来的潜在威胁,贸易公会逐渐发展成商会,并规定了有关工作条件、学徒期限、竞争和价格等的细则。

华人对所隶属的团体具有很高的忠诚度,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基于方言建立的社团的凝聚力。某一种方言社团可以通过语言和经济上的联系确立自身在某一特定行业的位置或主导地位。闽南方言群来自厦门地区,主要控制海上和沿海贸易,尤其是像新加坡这样的主要港口;客家人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和农业领域,其中大埔人还可能涉足典当行业;而来自潮汕地区的潮州人主要控制碾米工业,尤其是

在泰国,而在马来西亚,这种状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海南人则在咖啡店和流动餐车服务行业找到了立足之地。其他较小的群体,如兴化人主要涉足自行车行业,一些客家人从事锡制品行业,许多来自湖北的人则经营牙科诊所。

(三) 文化价值

赫尔曼·卡恩是最早探讨儒家文化在东亚经济发展中所发挥作用的西方学者之一。他承认:“通过文化优势很难得出结论,但我们相信这是成功的核心。”^[35]一定要在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得出某种言过其实的结论,或者暗示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似乎都有些近似于沙文主义的文化决定论的味道。然而,文化价值在经济发展中已经不仅仅是发挥配角的作用。在对新儒学思想的研究中,卡恩指出:“在培育忠诚度、奉献精神、责任意识、承担义务以及增强自身在某个组织中角色意识、加强对组织的认同方面,新儒学文化具备显著优势。这些将使得经济与社会的运行更为平顺而不会导致平均主义、分裂、相互对抗、过度补偿与压抑。”^[36]

华人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的辛勤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进取心和对成功的不懈追求,而在这种精神背后正是一种关注现世且追求卓越的文化。中华文化注重以人为本和自强不息,且所获得的成就并不仅仅满足于个人利益,而是为家庭的整体利益着想。相对于代表个人利益的“小我”,正是“家庭”体现着一种象征集体利益的“大我”。因此,无数个人的成功就会对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成积累效应。

正是群体的集中表现和文化特质的作用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这种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和不服输的文化品质并不是东南亚华人所独有的,相反这些价值品质被公认是所有华人处世方式的内核所在,并且这些个人的行为最终会对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正面、积极的聚合效应。

对现世的关注使华人带有一种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由于有着共同的移民出身且没有受到社会障碍的处处限制,华人并不会挑剔他人的社会出身。他们所体现的成就导向型文化注重成功和学习,这使他们逐渐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许多华人企业家白手起家的经历正好为这种文化提供了诠释。他们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却成为商业帝国的缔造者^[37]。

建筑行业是需要很长时期经营才能获得成功的

① 这些法则是:能识人,能接纳,能安业,能整顿,能敏捷,能讨账,能用人,能辩论,能办货,能知机,能倡率,能远数,见 Wee Chow Hou, *The Inspirations of Tao Zhu-gong: Modern Business Lessons from an Ancient Past*, Singapore: Prentice Hall, 2001, pp. 6-10.

典型例子。经验丰富的建筑承包商承认,至少需要10年时间才能洞悉这个行业的运行概况^[38]。在这条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上,许多华人企业大亨倾注了多年的心血^①。

马来人很少会选择一条艰辛的创业之路,而是试图直接进入最顶尖的大企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借助新经济政策取得了成功,一夜暴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马来西亚大部分中小企业都是华人开办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独立后的马来人享有大量优惠政策,但是他们却始终没有培养出必需的有熟练技能的马来劳动力,诸如建筑业工头、木匠或者其他种类的技术工人等^[39]。

信任或是信用是朋友或生意人之间诚信交易的文化价值观之一。是否履行义务是检验信用的标准。一般而言,业务往来都是按时进行,个人贷款的归还也没有过多纠葛。相比之下,马来西亚政府给马来人用以商业或教育的贷款则大部分没有归还,政府机构为了收回资金甚至不惜公布教育贷款者的姓名。这种社会现象的直接原因不得而知,但很可能是政府优惠政策所培育的“施舍”心理的副产品。

讲信用是儒家思想推崇备至的核心道德观。在中国古代,商号间的业务往来基于信用和发起者的道德权威,而书面合同是现代才有的发明。商人的信誉决定了其名声和“面子”,其重要性甚至超过生意本身。一个商人如果失去了信誉,那么不仅会被市场拒绝,其名声也会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害。

作为一种优秀的文化品质,勤俭节约很好地体现在较高的家庭储蓄水平上。储蓄的首要任务是为孩子的教育做准备,而教育又被看作是通向上流社会的门槛。因此,每个华人家庭都希望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以期将来可以获得一定社会地位并且为家族争得荣耀。

由于家庭是生活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从而家庭储蓄就成为资本形成的主要形式,进而家族企业也成为商业的标准模式。家族在道德上有义务维护其成员、亲戚和其他同族成员的利益;相反,这些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也有义务保护家族企业的利益。西方的新教价值观也倡导通过勤勉节约、诚实守信来努力赚钱,但与其服务“上帝”的目标和追求不同的是,华人并不是为了神圣的目标,而是为家族利益和现世的需要而赚钱。

家族企业无论规模大小,都会给家族带来诸多

好处。它可以给其成员提供工作,而且常常作为经商的“培训基地”。许多成功的华人企业家都是从家族企业的学徒身份开始他们自己的事业的。雇用家族成员也可以避免劳工问题与劳资纠纷。

尽管家族企业盛行,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常常惨淡经营,缺乏资本。由于家族企业的家长式制度,其决策与管理极其僵化,灵活性不强。家族企业常常因为缺乏远见导致到第二代时就已驻足不前,第三代时则大多倒闭。

对于文化价值与经济的关系,卡恩认为,“基本文化价值观的细微变化将导致结果出现很大差异。”^[40]白鲁恂(Lucian Pye)也提出相似的假设:“不同环境中的相同文化价值观通常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41]早期东南亚社会政治环境与传统的中国社会有很大的不同,这给华人的足智多谋与创业精神提供了肥沃的生长土壤和广阔的发挥空间。此外,由于远离封建朝廷等级制度下的压抑的社会环境,华人可以忽略儒家文化中的轻商思想,转而只关注其家族伦理道德观。他们不再受到官僚的盘剥,从而可以使其利润最大化^[42]。

由于不再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对商业的种种侵蚀和影响,华商越来越注重协调个人利益与更大的集体利益。许多华人公司把“义”字作为宗旨,关心职员的需要,讲究任人唯才,把和谐的工作氛围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许多企业还积极资助社会发展,尤其是在教育和慈善领域。在华人社区乃至中国本土,企业家发起与支持教育设施建设的例子不胜枚举。在马来西亚,有61所中学全部由华人社会出资建立。除此之外,还有1,290所小学每年都获得华社的捐助。他们还资助医院、福利院和社区服务。

五 一些启示

从华人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确切的启示。这些启示主要来自于华人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单个国家所拥有的人口及其所占比重。其中两个重要的启示涉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发展和东南亚未来的发展趋势。

奈斯比特(Naisbitt)于1994年提出:“亚太地区的华商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力量。”^[43]华人与东南亚、东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的崛起对中国的崛起产生了重要

① 例如马来西亚两家大企业的创始人——云顶集团的林梧桐和杨忠礼集团的杨忠礼,都是从小型建筑承包商起步的。

影响。海外华人的全球网络通过家庭、宗族以及其他商业渠道（例如定期的世界性商业大会）在全世界聚集了由资本、企业家、信誉与商业联系组成的巨大资源。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就像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华人给东南亚带来的发展一样，但其规模和速度却数倍于后者。我们在如今的中国所看到的，就是在存在了几千年的文化平台上进行意识形态政治改革的结果。政治改革释放了从前被压抑的巨大能量并将其转化为创造力。

虽然东南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确实受益于华人对于经济的持续影响力，但现如今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地区的华人正在经历老龄化。目前东南亚华人人口正面临出生率不断下降、年轻一代移民到别的国家、无法获得足够的外来移民补充等问题。新加坡由于实行了积极的移民政策，通过给予年轻一代优秀移民永久居留权来弥补出生率的下降，因而受到的影响最小。马来西亚的情况最为严重，因为自二战以后华人向马来西亚的移民就基本终止了。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下，假定华人人口比重与人均国民收入（在国家或地方层面上的）有紧密联系，那么华人人口的缓慢增长及其所占比例的持续下降必将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40年来，马来西亚沙巴州华人人口的比重下降了一半，其经济发展相比其他州也变差了^[44]。

很明显，华人与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有比较可信的证据支持的，只是这种联系的紧密程度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考证。不过，这种联系背后的缘由又是清晰的，这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六 结论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殖民时

期，以保护财产权为要义的法制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在吸引投资、劳动力和企业家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独立之后，经济发展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它已经成为各国政府需要面对的一个高度专业化和极具技术性，并且必须时刻紧跟国内国际形势的领域。

自然资源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初的条件但不会起到决定作用。新加坡与其他“亚洲四小龙”成员的发展案例表明了人力资源所起的关键到作用。成就导向型社会与一个廉洁的政府是发展的根基，而激励机制会造就政府、企业家和劳动力的团结。华人是东南亚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中的一个相对完整的组成部分，但众多种族和文化群体也都对各自国家的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除新加坡以外，这些国家的土著居民与经济的关系却与华人截然不同。成就导向使得华人拥有可以敏锐察觉到经济发展重要机遇的“心理模式”，而土著的“心理模式”则很少有财富创造导向，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如何促使国民在心态和行为上更倾向于追求“成就”，依然是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挑战。

种族因素一般不会被当做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因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种族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是一种不能进行定量分析的难以捉摸的特性。但是，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正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45]。

本文并没有对种族群体的文化品质做出任何判断，它只是试图说明这样的一种经济现象：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华人社群的相对规模与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的人均收入之间都存在明确的联系。文章的目的在于，指出这种联系并非偶然，而是与文化因素有关。

【注 释】

[1] Chang Tsuen-Kung,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ese Settlement in the Malay Archipelago*,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54, p. 34.

[2] Chang Tsuen-Kung, op. cit., pp. 19-21; 周伟民、唐玲玲：《中国与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海南出版社，2008年。

[3] Chang Tsuen-Kung, op. cit., pp. 17-18.

[4] Shellabear, W. G., "Baba Malay", *A Centenary Volume, 1877-1977*, MBRAS Reprints, No. 4, 1977, pp. 36-46.

[5] Pan, Lynn, "Definitions", in Lynn Pan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Archipelago Press, 1998.

[6] He Zhaowu, Bu Jinzhi, Tang Yuyuan and Sun Kaitai,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1; 何静、韩怀仁：《中国传统文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7-47页。

[7] 徐德志：《世界华人生意经》，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年。

[8] Kahn, Herman,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9 and Beyond*, New York: Morrow Quill Paperbacks, 1979, p. 332.

[9] Voon Phin Keong, "Pioneers, entrepreneurs, and

- labourers: build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statehood", in Voon Phin Keong ed, *Malaysian Chinese and Nation-building*, Vol. 1,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2007, pp. 43 – 94; Voon Phin Keong, "Culture and business in Malaysia: contribu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Sarawak Chinese Cultural Seminar V*, Sibul, April 19, 2009, pp. 38 – 65.
- [10] Wu Teh Yao, "Confucian culture as world culture", in Cheu Hock-Tong compiled, *Confucianism in Chinese Culture*, Suba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2000, p. 148.
- [11]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center", *Daedalus*, Spring 1991, pp. 1 – 32; Wu Teh Yao, op. cit., pp. 149 – 156.
- [12] Perkins, Dwight H., "Introduction: the persistence of the past", in Dwight H. Perkins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Stand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
- [13] Hussein Alatas, Syed,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London: Frank Cass, 1977.
- [14] Voon Phin Keong, *Indebtedness and Land Use in Pre-war Malay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Indigenous Society*,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V. R. F Series No. 142, Tokyo, 1987.
- [15] Ailsa Zainuddin, *A Short History of Indonesia*, Stanmore. NSW and Melbourne: Cassells, 1968, p. 145.
- [16] Furnivall, J. S., *Netherlands India: A Study of Plural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17] Ismail Noor and Muhammad Azahan, *The Malays Par Excellence... Warts and All: An Introspection*, Subang Jaya: Pelanduk, 2000, pp. 116 – 127.
- [18] Senu Abdul Raham ed., *Revolusi Mental*,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1970, p. v.
- [19] Ibid., p. 55.
- [20] Landes, David,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 1999, p. 523.
- [21] Mahathir Mohamad, *Malaysia: The Way Forward*,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Research & Services, Malaysian Business Council, 1991.
- [22] Malaysia, Government of 2006, *Ninth Malaysia Plan 2006 – 2010*, Putrajaya: Economic Planning Unit,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2006.
- [23] Voon Phin Keong, "Whither the Malaysian nation-state?", in Voon Phin Keong ed., *Malaysian Chinese and Nation-building*, volume 2,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2008, pp. 729 – 767.
- [24] Li, Tana, "Vietnam", in Lynn Pa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Archipelago Press and Landmark Books, 1998, p. 232.
- [25]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stralia,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Asi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1995, p. 63.
- [26] Schwarz, Adam, *A Nation in Waiting: Indonesia in the 1990'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with a chapter entitled "The race that counts"), pp. 98 – 132.
- [27] Lim, P. Pui Huen, *Wong Ah Fook: Immigrant, Builder and Entrepreneur*,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2002, p. 109.
- [28] Wee Chow Hou, *The Inspirations of Tao Zhu-gong: Modern Business Lessons from an Ancient Past*, Singapore: Prentice Hall, 2001; Freedman, Maurice, "The handling of money: a note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economic sophisti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 H. Silcock ed., *Readings in Malayan Economics*,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61, pp. 38 – 42; Gosling, L. A. Peter, "Chinese crop dealers in Malaysia and Thailand: the myth of the merciless monopsonistic middleman", in Linda Y. C. Lim and L. A. Peter Gosling eds.,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Volume 1: Ethnicity and Economic Activity*, Singapore L Maruzen Asia, 1983, pp. 131 – 170; Voon Phin Keong, "The Chinese merchant then and now: emergence and social position inside China and out",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2001, vol. 4, pp. 79 – 112.
- [29] Light, 1972, pp. 35 – 36.
- [30] Tan Ee Leong, "The Chinese banks incorporated in Singapore an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in T. H. Silcock ed., *Readings in Malayan Economics*,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61, pp. 454 – 479.
- [31] Lin Wei-Wu, *The Survey of Nanyang Chinese Economy (translated from Japanese by Chu Ji-Cheng)*, Dept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Taiwan Governor General's Office, 1943, in George L. Hicks ed.,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s from Southeast Asia 1910 – 1940*, Singapore: Select Books, 1993, p. 190.
- [32] Ibid., p. 192.
- [33] Winchester, Simon,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New York: Harper, 2008, p. 68, p. 70.
- [34] Wang Tai Peng, *The Origins of Chinese Kongsis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94.
- [35] Kahn, Herman, op. cit., p. 339.
- [36] Ibid., p. 122.
- [37] 同 [7]。
- [38] Koon Yew Yin, "Towards competitive indigenous Malaysian contractors", *Malaysiana*, Nov. 18, 2009.
- [39] Ibid.
- [40] Kahn, Herman, op. cit., p. 123.
- [41] Pye, Lucian W, " 'Asian Values': from dynamos to dominoes?", in Lawrence E. Harrison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eds.,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 245.
- [42] Ptak, Roderich, "Merchants and maximization: notes on Chinese and Portuguese entrepreneurship in maritime Asia, c. 1350 – 1600", in Karl Anton Sprengard and Roderich Ptak eds.

Maritime Asia: Profit Maximisation, Ethics, and Trade Structure c. 1300 - 180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4, p.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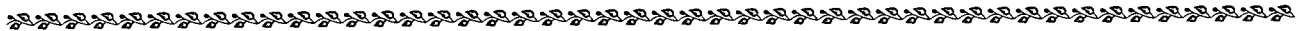
[43] Naisbitt, John, *Global Paradox*, London: Nicholas Brealey, 1994, p. 216.

[44] Voon Phin Keong, "Pioneers, entrepreneurs, and labourers: build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statehood", in Voon Phin Keong ed, *Malaysian Chinese and Nation-building*, Vol. 1,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2007, pp. 43 - 94; Voon Phin Keong, "The Chinese in Sabahan society and economy: overview and prognosis", in Voon

Phin Keong ed., *Malaysian Chinese and Nation-building*, vol. 1,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2007, pp. 393 - 428.

[45] Landes, David, "Culture makes almost all the difference", in Lawrence E. Harrison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eds.,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p. 2 - 13; Harrison, Lawrence E. and Huntington, Samuel P. eds.,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责任编辑：吴宏娟】



(上接第 49 页)

【注 释】

[1] 乔林生：《日本对外政策与东盟》，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第 26 - 60 页；邓仕超：《从敌对国到全面合作的伙伴——战后东盟—日本关系发展的轨迹》，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年 1 月，第 18 - 28 页；陈奉林：《冷战时期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探索》，《世界历史》2005 年第 1 期；劳伦斯·奥尔森著，伍成山译《日本在战后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 6 月，第 11 - 66 页；米庆余、肖伟著《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新华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 83 - 90 页，等等。

[2] 亚洲开发银行编写组：《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 页。

[3] Roy Culpeper, *The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Titans or Behemoths*, Canad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7, p. 2.

[4] Ming Wan, "Japan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acific Affairs*, Vol. 68, No. 4, Winter, 1995 - 1996, p. 509.

[5] 丸山静雄著，石宇译《东南亚与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 5 月，第 16 页。

[6] 同 [5]，第 121 页。

[7] 朱振明：《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现代国际关系》1989 年第 4 期。

[8] Po-Wen Huang, Jr.,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New York: Vantage Press, 1975, p. 15.

[9] Ibid., pp. 17 - 18.

[10] Takeshi Watanabe, *Towards a New Asia*, Singapore: Times Printers, 1977, p. 5.

[11] Dick Wilson, *A Bank for Half the World; the Story*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1966 - 1986), Manila: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1986, p. 3.

[12] Dennis T. Yasutomo, *Japan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3, p. 49.

[13] Po-Wen Huang, Jr., op. cit., pp. 45 - 46.

[14] Po-Wen Huang, Jr., op. cit., p. 48.

[15] Dick Wilson, op. cit., p. 30.

[16] ADB,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rticle 33).

[17] Nitish Dutt, "The US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Origins, Structure and Lending Oper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1, No. 2, 2001, p. 252.

[18] Jonathan R. Strand, "State Power in a Multilateral Context: Voting Strength in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5, No. 3, 1999, p. 279.

[19] ADB,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rticle 36).

[20] Dennis T. Yasutomo, op. cit., p. 85.

[21] 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Report, 1972. Cite in Nitish Dutt, op. cit., p. 250

[22] 乔林生：前引书，第 51 页。

[23] Stephen D. Krasner, "Power Structur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Bank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5, No. 2, Spring, 1981, p. 319

[24] Robert · Wihtol,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Development Financing or Capitalist Export Promo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9, Issue 3, 1979, p. 299.

【责任编辑：邓仕超】